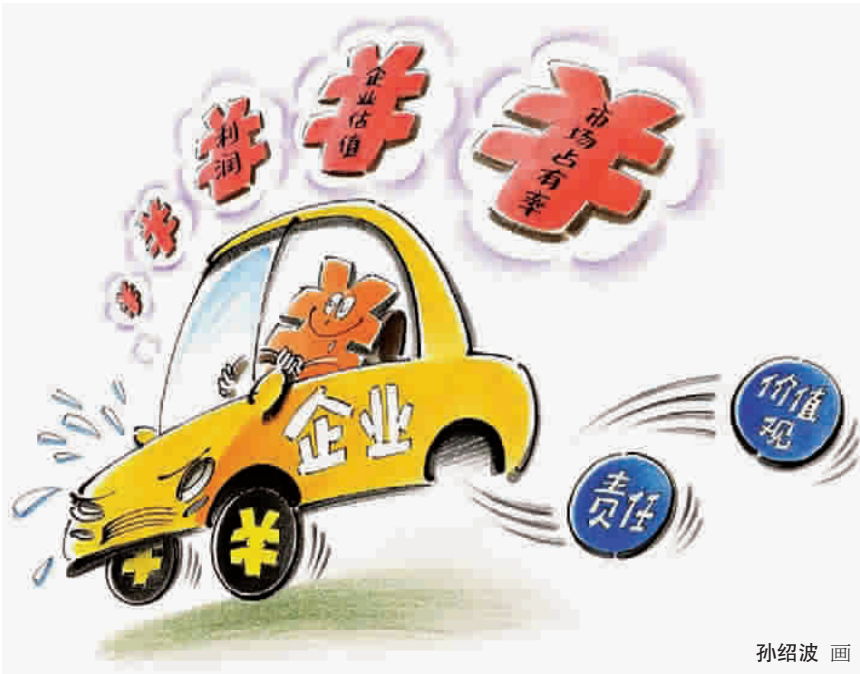




假如你是滴滴的股东

谈 璎



孙绍波 画

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一部分人是滴滴出行的用户，极少数人是它的股东。但是，数天前发生了21岁空乘小李姑娘半夜搭乘滴滴顺风车被司机残忍杀害案件后，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滴滴的股东，你该做些什么？

滴滴身后，代表着资本力量的股东们有没有反思和自责不得而知。至少，一定数量的滴滴用户在感叹懊悔，自己曾通过滴滴叫车，来的车辆牌照和手机上显示的不是同一辆，或者司机的服务明显有偏差，将就着坐了，没有去较真。如果当时都能拒乘、及时投诉、不纵容这种睁眼闭眼的管理，敦促滴滴整改，是不是悲剧能够避免发生？

一个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经济学认为，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分歧一直存在。1970年，经济学界“大咖”弗里德曼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提出企业高管的职责是根据股东的渴望开展业务，而股东的渴望是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同时遵守社会的基本规则，包括法律规则和风俗习惯。当时很多公司CEO的看法是，企业同时应该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弗里德曼在文章中表示不同意，提出公司的高管就应该关注企业的利润或者说市值的最大化，赚的钱分给股东，让他们自行选择是否做慈善。

上周五，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教授正好来到上海高金的SAIF·CAFR名家讲堂，对新产融结合时代的公司治理发表演讲。他提出，企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合适的目标，但是把股东利益等同于公司的市场价值，则过于狭隘。

哈特教授说，企业的股东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普通人，不只关注金钱，还关注社会责任和道德。尽管现在买电动车比燃油车更贵，

但为数不少的人选择买电动车，因为注重环保；尽管在家里或花园节约用水会给自己带来不便，但仍有人乐此不疲，因为认识到水资源的珍贵。人们不仅仅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还会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这些消费者可能同时是某些企业的股东。哈特教授反问道，作为企业股东他们难道不希望其投资的公司也能够关注社会效益吗？企业的赚钱行为和它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不能够完全依赖政府来实现所有的社会责任。

那么，回过头来看滴滴。平心而论，相比欧美国家法律法规的限制和对隐私保护等的重重顾虑，整个中国社会对滴滴等互联网创业企业宽松包容鼓励，支持资金充裕。好风凭借力，野蛮来生长。各国青年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其中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占据三席。在新经济公司发展发展到一定的市场份额，形成近乎垄断的局面后，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应该承担起自身应有的企业责任时，有的视若无睹，变得傲慢。于是我们看到，滴滴的叫车功能虽具有一部分共用事业的性

质，却开始随意加价，打车便利度下跌，用户需要支付更多；摩拜和ofo互拼投放量市占率，视人行道为免费停车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携程掌握了用户消费习惯数据后“杀熟”；之前，还有BAT等巨头因放任假货泛滥、广告信息误导等，备受外界指责或导致在国外股价长期低迷。

因此，当一个新经济企业大到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时，此时仅凭企业高管的良心和道德感来约束其对利润和市场占有率的极度追求，平衡好企业赚钱和责任的关系，看来远远不够。滞后的法律法规建设应该尽快跟上，对企业服务质量定出详细规范，可考虑一票否决违反社会对安全要求底线的企业，同时鼓励更多的市场竞争来防止垄断。

如果滴滴的高管认同利润、市场占有率、企业估值至高无上，企业运营中乘客的满意度可以靠后站，甚至司机管理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乘客安全保障缺失，如果你是滴滴的股东，是时候出手，对企业的价值观强力纠偏责无旁贷。在民意汹涌的大事件面前，悬赏捉坏人这类公关手段可以休矣，拿出实在而彻底的整改措施，为用户、为企业亡羊补牢方为正道。试想一下，如果一家乳品企业销售毒奶粉、食品供应商使用地沟油，即使再怎么捐款做慈善，那只能叫伪善，结局必定是关门。企业最基本的善，是产品让大众受益，为社会贡献价值，同时自身获得发展壮大。做负责任的企业，短期可能会影响部分利润，然而利在长远。身为股东，切勿短视。

电影《蜘蛛侠》里有句著名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当新经济领域冒出越来越多“巨无霸”“独角兽”时，请股东们看重估值之余，不要忘记社会职责所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为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94年前，上海女性发出“男女平权”宣言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上世纪20年代，如今淮海路黄陂路口这片土地还被称作“霞飞路宝康里54号”时，曾发生过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可以说，和全上海，乃至全中国女性命运息息相关。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并号召在沪召开各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然而，所有团体中没有包括妇女团体。1924年12月21日，一场由上海女权运动委员会等上海21个妇女团体发起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宝康里成立。这场被当年《民国日报》评价为“中国女界空前的集会”，发出“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女子”呼声。

要求男女平权

1924年初，国共两党开展第一次合作。在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在这过程中，妇女的声音始终微弱。这一局面的改变，离不开一名湖南女子的奔走，她就是向警予。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先后就读于湖南省



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可以说，从学生时代起，“男女平等”的思想就深深根植于她的脑海。毕业后，向警予回到家乡，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

从那时起，向警予就担任了党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参加了中共中央历次关于妇女运动文件的起草，并以上海为重点，积极开展以劳动妇女为骨干的妇女运动。1923年，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决定接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成立，并在女党员中建立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共有委员30人，由向警予主持日常工作。

为促使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妇女运动委员会等15个妇女团体12月5日联合发表声明，号召筹备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12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正式成立，到会600余人。刘清扬、向警予、杨之华、钟复光、张琴秋等5人被推为执行委员。

在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向警予还代表妇女同胞发出呐喊和呼吁。

历史进程被推动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的成立，带动了全国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的建立。1925年1月，向警予等带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演讲队，冒雨到华界演讲。她在《妇女周报》发表《国民会议与妇

专家
点评

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

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是全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课题。1924年，由上海女权运动委员会等上海21个妇女团体发起的争取男女平权的运动，虽然时间短，社会影响也并不大，但这场运动毕竟当时泛起了涟漪，也在上海的红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清扬、向警予、杨之华、钟复光、张琴秋等发起者，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她们的思想与行动，激励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代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前进方向，也为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历史应该铭记。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原霞飞路宝康里54号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女”，疾呼“妇女与男子不过性的区别，而其国民身份则无二致。”

妇女运动真正的胜利，出现在1925年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上。1925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开幕。3月19日，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针对段祺瑞政府的《国民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中关于选举与被选举权仅限于25岁以上男子的规定，发通电声明：“此等蔑视女子人格，剥夺女权的条例，吾妇女誓不承认其有效。”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一方面致电段祺瑞政府，表示如果国民会议不许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则二万万女国民不承认国民会议；另一方面则致电在北京参加促进会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刘清扬和钟复光，让她们联合各地妇女代表竭力抗议，请愿修正。同时还电告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各妇女团体、各女校，希望共同起来反对善后会议制定的男女不平等条例。

为力争修改条例，1925年3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在四川路中央大会堂召开上海女国民大会，由40余个团体的200多人参加。大会主席向警予在报告中指出，妇女要一个肩膀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膀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在全国各界妇女群起抗争的压力下，国民会议专门委员会特别审查会把第14条“凡中华民国男子满二十五岁以上”中的“男子”二字改为“国民”。一词之差，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逐渐到来。